



复旦
中文
丛刊
学术

貞石詮唐

陈尚君◎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学复
术旦
丛中
刊文

貞石詮唐

陈尚君◎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贞石论唐/陈尚君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4(2016.9重印)
(复旦中文学术丛刊)
ISBN 978-7-309-11996-1

I. 贞… II. 陈… III. 石刻-文献学-中国-唐代-文集 IV. ①K877.4-53②G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8877号

贞石论唐

陈尚君 著

封面题签/徐俊

责任编辑/宋文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9.75 字数 420千

2016年9月第1版第2次印刷

ISBN 978-7-309-11996-1/K·559

定价:8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陈尚君，1952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治学遵循传统，长于文献考据，对中国中古文献有较全面的把握，对唐五代基本文献建设用力甚勤。著有《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及论文集《唐代文学丛考》《陈尚君自选集》《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敬畏传统》等。主持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发表论文及各类文章逾三百篇。

自序

石刻之学，昉自北宋欧阳修，积平生所得金石逾千品，所撰《集古录跋尾》屡言石刻可见古今政事之兴衰，可知历代文章之演变，可观汉晋以来书迹之风韵，可为考订文史典籍之佐证，鸿论博稽，诚为有识。继起者赵明诚所得更倍之，所述尤重金石考史一途，为学亦更为细密。欧之所见，今知其目者约存十之七八，赵之所见，则《金石录》前十卷记载全备，二家所见而存于今者，约仅十之二三。至南宋而为显学，若《通志·金石略》《隶释》《宝刻丛编》《宝刻类编》《輿地纪胜》诸书记录汉唐石刻，较欧、赵又复倍之，存于今者亦寥寥。亡失之多，学者每为浩叹。多年前因辑补唐文，同时作《唐文待访目》，逐一记录宋人所见而今不存者，凡数千篇，记录虽详略不同，足资考证者实多，正不必因原石不存而轻弃也。

所幸贞石不朽，幽隧难掩，百年沧桑，刊布尤富。自清中叶以降，尤以王昶、陆增祥、端方、罗振玉、张钫、李根源等前辈积累自富，刊世亦亟，遂使贞珉秘拓，化身千百，得为一般学子所知，弥可珍贵。近三十年则因科学考古，规模基建，以及民间私掘等故，仅墓志一项刊布即逾八千方之多。虽其间多干犯国禁，破毁旧藏，天人共怒，学者不齿，守护文化，打击犯罪，是有司之责，亦全社会当关注者。唯收拾零残，存留记录，则有识者之努力又何可轻忽。不幸之幸，今可见之唐石居然数倍于欧赵之所得，其于唐一代文史研究之意义，实在是极其巨大。前辈尝言，唐以前文献太少，学术之纠纷终难得定讞；唐以后文献太多，学者以一生之力难以通治一代，唯唐代不多不少，为治学之最佳试验田。此不多不少之文献，百年来更得敦煌文书、域外典籍、释道二藏以及石刻文献无数新见资料之滋润，所取得之成就，正所谓日新月异，有天地翻覆之气象。专治唐一代之学者如陈寅恪、岑仲勉、严耕望、黄永年、张广达、傅璇琮、陶敏等成就卓著，皆凭藉对存世典籍、新见文献之全

面掌握与参互发明。厕身于此一时代而专治有唐如我，庆慰何如！

早年读岑仲勉先生《元和姓纂四校记》《唐史余渾》《唐人行第录》诸书，深佩其广引石刻以纠订遗史阙文，搜罗既博，考订尤密，私心颇向往之。至1985年见文物出版社影印张钫旧藏《千唐志斋藏志》，亟购一册，且即据以订正《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失，为我治唐石刻之起步。匆匆不觉已近三十年，所撰长短文字约得数十篇，或据以考史，或藉以补诗，考人物得前所未知，稽典籍亦收获颇丰。时风所及，不甘寂寞，偶或论及政事得失，闺帷隐情，世家谱系，名人轶事，幸亦能发明一二。其他论述偶或引及者，尚不在此数。

适陈引驰教授主系政，有《复旦中文学术丛刊》之规划，知我留连唐石刻多年，乃嘱编次。遂清点旧文，粗成此编，略作铨次，分为五列。其一通述石刻文献之研究意义，其二据石刻考订文史而能淹贯一代者，其三以个案研究为主，其四为书序书评及综述，末以长沙窑瓷器题诗二篇附录。短札而不能轻弃者，亦总题《贞石偶得》附入。所收诸文，均存发表时旧貌，其有失误须订正、新石可补充、重见宜删削、议论欠周允处，为精力所限，不能一一是正，幸祈读者谅之。责编宋文涛多有匡正，老友徐俊惠赐题签，心存感铭，谨致谢忱。

甲午仲秋，陈尚君谨述。

目 录

自序	1
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研究	1
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史研究	26
石刻所见玄宗朝的政治与文学	38
唐代的亡妻与亡妾墓志	59
唐代翰林学士文献拾零	90
石刻所见唐人著述辑考	138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补二则	157
贞石证五代史	169
陈寅恪先生唐史研究中的石刻文献利用	186
跋王之涣祖父王德表、妻李氏墓志	193
新出高慈夫妇墓志与唐女书家房嶙妻高氏之家世	200
《郑虔墓志》考释	207
《殷亮墓志》考镜	233
杜佑以妾为妻之真相	259
《本事诗》作者孟启家世生平考	271
《才调集》编者韦毅家世考	286
石刻所见唐代诗人资料零札	292

贞石偶得	308
法宣其人	308
《陆让碑》撰人	309
唐诗人二李昂	310
韦应物一家墓志的学术价值	312
《安禄山事迹》的成书年代	314
郑嵎家世	315
王仁裕碑	316
《集古录》及跋尾之成书	318
正定巨碑考实	320
《钓矶立谈》作者考	324
述《篆云楼金石文编》	326
石刻文献述要	327
影印清吴式芬稿本《舆地金石目》《贞石待访录》解题	335
影印清王仁俊稿本《金石三编》解题	342
评张沛《昭陵碑石》	347
评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一、二辑	353
评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	358
气贺泽保规《新版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出版以来新发表唐代墓志 述评	368
《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新见文献述评	387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初读述感	407
户崎哲彦教授桂林石刻研究著作两种评价	423
李鸣《回忆张钊先生文选集》序	430
长沙窑唐诗书后	435
从长沙窑瓷器题诗看唐诗在唐代下层社会的流行	440

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研究

二十世纪的中国唐代研究,因为大批新文献的发掘利用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新文献中首屈一指的当然要数敦煌文献,敦煌学已成为国际汉学界的显学,为大家所熟知。其次就是石刻文献。由于大规模基本建设和科学考古的展开,新发现的石刻数量极其巨大,总数也达数万件,其中有刻石文字的超过万件,所涉内容极其丰富。唐石研究汇考在清中后期到民国初年曾形成一个高潮,但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学者的研究兴趣更多地转入上古先秦考古,传统金石学虽仍有延传,但已不再居于中心位置。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说,新出石刻都远远超过了清人所见,但就系统研究的成绩来说,则还显得很不够。最近十多年间,这一状况已逐渐有所改变,但仍远逊于敦煌研究的深入充分。近年,一些唐研究学者已注意到,由于大宗的敦煌遗书已全部发表,有关研究已做得很充分,不太可能再有大的突破,而尚未充分发掘的唐代石刻文献,其中包含了唐代社会文化各方面的丰富资讯,可望成为唐研究的新热点。对此我深表赞同。今年四月,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唐史新概念国际研讨会上,作了《新出石刻与唐研究》的特别报告,主要谈石刻对唐史研究的意义。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谈谈石刻之于唐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一、近二十年唐代石刻的影印和整理

宋代金石学兴盛,宋人见到并留下记录的唐代石刻超过三千品,可惜不曾有人像洪适编《隶释》汇录汉碑文字那样汇录唐石文字,宋人得见的唐代石刻十之八九没有存留下来。清中叶以后唐石研究渐成风气,存世的专著超过百种,以王昶《金石萃编》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为集大成之作,

陆书名气稍逊于王书,但就学术质量来说,则要好得多。

二十世纪上半叶唐代石刻的汇录,以端方《匋斋藏石记》(商务印书馆1911年石印本)、罗振玉编印《冢墓遗文》系列(均有罗氏自刊本)和张钫编《千唐志斋藏志》(仅以拓本流传)最为大宗,存录唐墓志总数超过两千多方。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相对来说缺乏有规模的建树,只有两种《长安城郊隋唐墓》可以一提。学者要利用石刻文献,只能从几个大图书馆中翻检拓片,很不方便。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这一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首先是旧辑、旧藏石刻拓本的集中汇印,先由文物出版社影印了张钫《千唐志斋藏志》(1984),收唐志达一千二百多方;齐鲁书社又影印李根源《曲石精庐藏唐墓志》(1986),篇幅不大,颇存精品,泉男生和王之涣二志尤受学者重视;稍后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唐五代部分有二十多册,占全书约一半,收唐代各类石刻拓本超过三千种;台湾毛汉光编《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从1985年开始出版,每册一百件,到1994年出至第十八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81种)而中辍,仅收录到开元十五年。该书兼收石刻和典籍中的唐墓志,采用拓本影印,附录文和考释,录文除据拓本外,又据前人校录和有关文献予以校订,考释则备录前贤研究意见,复援据史籍作出考按,在同类各书中体例最称善备。上述诸书所收,均为1949年前所出石刻,多有重出,但所据拓本不同,可以互校。毛汉光所录有十多方为他书所未见。

汇聚前人的石学著作的工作也应提及。台湾学者编《石刻史料新编》,已出一至三编九十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1986年),将历代石学著作,包括方志中的石刻部分影印汇为一编,虽编辑略显粗糙,却是方便学人的无量功德之举。中国国家图书馆金石组编《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较前书篇幅稍小,重要诸书均收录,也便于检用,惟按时期编录,将前贤各书割裂剪接,于已用之书也颇多挂漏,未能臻善。

1949年以后新出碑志的辑校录工作,到90年代才得以系统出版。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多达三十册,其中陕西四册大多为新出墓志,洛阳卷多达十五册,除收录了前述《千唐》《曲石》和罗录各书的拓本外,也包括了部分五十年代以来的新出墓志,另外如山西、江

苏、北京各册也颇多新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虽仍以旧志为主,也包含了一定数量的新志,只是此书由于发行面较窄,不为一般学者所知。稍后的《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则收录了到九十年代中期的新见墓志,体例也更为严谨,录文和考释都颇见工力。《洛阳新获墓志续编》也已编成,收唐代墓志二百六十多方,不久应可出版(见《华夏考古》2000年第3期李献奇《唐中眷裴氏墓志丛释》)。张沛编次的《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汇聚了昭陵博物馆几十年来的工作业绩,包括了一大批唐初名臣懿戚的碑志,分量大大超过了罗振玉的《昭陵碑录》,只是该书的大碑拓本缩得太小,无法辨识,录文又未充分吸取以前学者的成绩,稍有缺憾。中国文物研究所与地方文物研究所合作编纂的《新中国出土墓志》,已出《河南》第一册(文物出版社,1994年)、《陕西》第一册(文物出版社,2000年)和《重庆》册(文物出版社,2002年)。此套书以各省市、县为单元收录新出历代墓志,唐代约占三分之一左右,包括图版与录文、考释,说明出土时地,编次较为科学。此外,各种文物考古学杂志也发表了大量的唐墓发掘报告和唐石发现消息,各地方文物博物部门还有一批未经整理发表的碑志,一些私人收藏家也颇有珍藏,河南、陕西农户家中也时有收存。此外,近十多年间也颇有一些碑石流落海外。较著名的如数年前台湾大学叶国良教授在台北一古玩店中发现《兔园策府》作者杜嗣先的墓志,即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马克麾撰《唐正义大夫试大著作上柱国太原王府君(洛客)墓志铭》(《书法丛刊》2002年第3期刊拓本),载有一段王勃的逸事:“八岁能属文,十一通经史。……时有同郡王子安者,文场之宗匠也,力拔今古,气罩诗学,吮其润者浮天而涸流,闻其风者抟扶而飙起。君常与其朋游焉,不应州郡宾命,乃同隐于黄颡山谷,后又游白鹿山,每以松壑通云,樵歌扞月,□行山溜乳精,苏门长啸,有松石意,无宦游情。”王洛客字灵,延和元年卒时年六十四,推其生年,仅比王勃年长两岁。两位年轻才俊的同游经过,在史籍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此外,一些稀见珍拓的发表和古籍稿本的影印,也提供了一批珍贵文献。前者如隆尧《光业寺碑》完拓的发表,为陈寅恪先生所未见。此碑为开

元十三年(725)象城尉杨晋撰,叙赵州象城县僧民为玄宗八代祖宣皇帝、七代祖光皇帝陵园修福田而重饰光业寺事。陈寅恪先生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及《李唐氏族推测》等三文,其中有关李唐出赵郡李氏之推断,学者认为其因得引证《光业寺碑》而得定案。但陈先生仅据史语所藏拓及《畿辅通志》摘出数语,并不完整,此碑全文近三千字,包含唐初各帝崇祀事实。后者如上海图书馆藏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稿本,颇多清代稀见石刻的录文,《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据以影印,甚可重视。台湾影印《石刻史料新编》时也收录了一批清人稿本。据了解,中国各图书馆尚有一批类似稿本未经整理刊布,如复旦大学图书馆即存有《篆云楼金石文编》一百卷,分地域记录全国的石刻。

据石刻录文的著作,当首推周绍良等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全书录墓志三千六百七十六方,既包括宋以来的各种传世墓志,也包含了1983年以前的各种公私藏拓和已发表的石刻录文。该书按照石刻原件录文,十分忠实,且附有很细致的人名索引,极便读者。近出的《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继承了前编的体例,续收墓志一千五百六十四件,绝大多数是五十年代以来的新出土者,弥足珍贵,只是《续集》的校录质量明显逊于前编,与前编重复和本编重复的墓志即达数十篇。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七册(三秦出版社,1994—2000年),存文约四千二百篇,几乎全取石刻,墓志约占十之九五,与上述周编颇多重复,但包含了数量可观的陕西新出石刻,于《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见石刻也作了很认真的校录,值得重视。唯此书体例,系取《全唐文》未收者,但随得随刊,编次无序,既不循《全唐文》旧例,又不存石刻原貌,不说明录文来源,各册自成单元,利用颇不便。近出的《全唐文新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主要是将《全唐文》与上述三书拼合而成,没有新品增加。不久可出版的拙辑《全唐文补编》,主要致力于传世典籍中唐文的采辑,石刻仅录四部典籍、佛道二藏和地方性文献中所保存的,也有一定数量。

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汲古书院,1997年),按照墓志刻石时间为序,编录十种专书中收录唐墓志的情况,其中《石刻题跋索引》可作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编录唐墓志诸书的总汇,另九种

为《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千唐志斋藏志》、《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曲石精庐藏唐墓志》、《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唐代墓志汇编》和《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该书逐篇说明见于何书何页，甚便学者利用。

二、新出石刻与文学文献考订

金石学兴起于北宋，从欧阳修开始，就强调石刻可以正史传之阙误，可以知时政之得失，可以见文风之迁变，可以观书迹之精妙。后世的金石学家虽派别众多，但就治学的格局而言，并没有超过这一范围。中国近二十年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主流学派，试图从唐文学的基本文献建设入手，弄清唐代文学发展变化的全部真相，从作家生平交游、作品收集辨析、著作真伪流传，乃至所涉事件始末，皆求梳理清楚，再作系统深入的研究。唐代诗人大多生活在社会中下层，他们在文学活动中涉及大量著名或不太著名的人物，重要或不太重要的事件，众所周知或不太为人所知的制度习俗，写下有名或不太有名的作品，要将这些全部弄清，仅凭几种最重要的史书传记，显然很不够。传统的唐诗研究，多信用史传笔记及《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书所载诗人逸事，近年的研究，则深受陈寅恪、岑仲勉治史方法的影响，追求广泛、全面地占有文献，考订中注意史料的主次源流，强调作者本人作品更为可信，史书、方志、石刻、缙绅录中的记载，常比诗话、笔记的记载更为可靠。其中利用得最充分、最有资于理清事实真相的，当首推碑志石刻。碑志石刻虽为特殊原因之作，且普遍有颂谀虚饰的倾向，但其提供了某一特殊事件或人物的详尽原始记录，只要谨慎地加以鉴别，其可信度显然高出许多源出传闻或多次转写的存世文献。

新出碑志本身就是文学作品。二十世纪出土的唐石刻，仅墓志一体，即可在陆心源《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两书以后，再补录唐文约五千篇，约相当于《全唐文》所收唐文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包括了近千名知名和不知名作者的文章，其中唐五代重要文士如令狐德棻、上官仪、许敬宗、李义府、郭

正一、李俨、杜嗣先、崔融、徐彦伯、卢藏用、李峤、岑羲、郑愔、李义、韦承庆、崔沔、贾曾、卢僎、崔湜、薛稷、徐安贞、富嘉谟、吴少微、僧湛然、苏頲、贺知章、韦述、毋巽、郑虔、陶翰、姚崇、张九龄、苏预、颜真卿、徐浩、柳识、李华、萧颖士、柳芳、徐浩、吕温、吴武陵、崔群、令狐楚、宋申锡、李德裕、赵璘、南卓、裴度、郑畋、杨凝式、和凝等，都补充了新的文章。有许多著名诗人如李颀、韦应物、卢纶、陈上美、狄归昌、翁承赞、卢汝弼等，以往仅以诗为世所知者，以前没有文章留存，由他们撰文的墓志出土，弥可珍贵，当然会引起学者的莫大兴趣。张说、张九龄、吕温、韩愈、柳宗元等撰文的碑志，虽已收入其各自文集，但以石本与集本比读，均有较大的不同。其中除有集本传写错误的原因，重要的恐还在于集本所据应为作者的存稿，志主家人在刻石埋铭的过程中，不免还会有增改和润饰，并不全照撰文者的原稿。以下试举 1987 年河南巩县出土柳宗元撰《唐朗州员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为例，校以《柳河东集》卷十三所收该墓志，可以看到许多的异文：

唐朗州员外（集缺员外二字）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

唐故（集缺故字）永州刺史博陵崔简女，讳蹈规，字履恒（以上六字，集仅作讳媛），嫁为朗州员外司户河东薛巽妻。三岁知让，五岁知戒，七岁能女事，善笔札，读书通古今，其暇则鸣丝桐，讽诗骚以为娱。始简以文雅清秀重于（集下有当字）世，其后（集下有病惑二字）得罪投讷州，诸女蓬垢涕号。蹈规（集缺蹈规二字），柳氏出也，以叔舅宗元（集缺宗元二字）命归于薛。惟恭柔专勤，以为妇妻，恩其故他姬子，杂己子，造次莫能辨，无忤忌之行，无犯迕之气，一亩之宅，言笑不闻于邻。元和十三（集作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既乳，病肝气逆乘（集缺乘字）肺，牵拘左腋，巫医不能已。期月之日，洁服飭容而终，享年三十一，归于薛凡七岁也。十月甲子（以上十六字，集作年若干某月日六字），迁柩于路（集作洛）。其明年二月癸酉（以上七字，集作某月日）祔于墓，在北邙山南，洛水东。巽始以（集缺以字）佐河北军食有劳，未及录，会其长以罪闻，因从贬。更大赦，方北迁，而其室已祸。巽之考曰大理司直仲卿，

祖曰太子右赞善大夫环，曾祖曰平舒令煜，高祖曰工部尚书真藏。简之父曰大理司直晔，祖曰太常寺大乐丞（以上六字，集作某官二字）颯。唐兴，中书侍郎平章（以上六字，集作中书令三字）仁师议刑不孥，其五（集作二）世大父也。巽之他姬子，丈夫子曰老老（集缺一老字），女子子（集缺一子字）曰张婆，妻之子，女子曰陀罗尼，丈夫子曰那罗延（三字集作某），实后子。铭曰：翼翼仁师，惟仁之硕，一言刑轻，绵载二百。其庆中缺，曾玄不绩，简之温文，亦绍其直（集作卒昏以易）。七男三女，八我之出，仍祸六稔，数存如没。宜福而灾，伊谁云恤？惟薛之妇，德良才全（集作伎），邻无言闻，臧获以虔。推仁抚庶，孩不异怜，兄公是怡（集作怙），夫属衍（集作忻）然。髮鬣峩峩，笱豆维嘉，烝尝宾燕，其羞孔多。有苾有严，神飨斯何？奚仲仲虺，胡祐（集作佑）不遐，高曾祖考，胡嘏之讹？淑人不居，谁任于家？书铭告哀，以寘岩阿。

分析两种文本的差异，有关崔氏名字、其先人任官及丧事年月的增改，显然因柳宗元原文有缺项而由崔氏家人上石时补入。集云崔简因“病惑得罪”，“病惑”二字可能因崔家人以为不妥而删去。“亦绍其直”与“卒昏以易”的差别，或亦属同样原因。十三年与十二年的不同，五世与二世的的不同，应该是集本传刻之误，应予订正。清代学者凡遇石刻与传本不同时，一般都云当以石刻为正，其实是应区别对待的。同时出土有崔氏夫薛巽墓志，述其仕历和贬官原委较详，可为研读此篇柳文提供有益的佐证。

碑志石刻包含了大量社会民俗、道德信仰、宗法礼仪、婚姻继承、族聚迁徙等方面的丰富资讯，值得作多层面的探讨。碑志所记载的唐代人事关系和科举、历官、从业、年寿方面的内容，也因其文体的特殊性而包含了大量正史中所难以备载的珍贵记录，这些虽都属于历史学或社会学研究的范围，对文学研究也很有意义。这里重点还是讲石刻对研究诗人生平和研读作品的重要价值。

有诗篇传世的作者本人的碑志，新发现的已超过五十多篇，其中包括李密、杨恭仁、李贤、薛元超、韦承庆、严识玄、武懿宗、豆卢钦望、杨再思、韦希损、王无竞、崔泰之、张轸、张说、张九龄、郭虚己、李邕、王之涣、蔡希周、赵冬

曦、神会、李峰(神道碑)、郭虚己、陈希烈、高力士(墓志及神道碑)、崔沔、元德秀、吕渭、白敏中、杨汉公、谢迢、杨宇、杨牢、张晔、李邵、王涣、王镕、王仁裕(神道碑)等著名或不太著名的作者。

而大量碑志中所提供的可资考证作者世系、生平、交游和作品系年的线索,更是所在多有,值得学者作仔细的推求。八十年代初郁贤皓用北京图书馆藏石刻考证李白生平,周勋初用《千唐志斋藏石》和《芒洛冢墓遗文》所收高俚后人墓志,弄清了高适的家室世系,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据《王之涣墓志》所载其生平经历,判定薛用弱《集异记》所载广为后人称道的旗亭听诗故事,实为虚构的伪事,都是很突出的例证。以后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和《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周祖谟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基本理清了全部唐五代文学家的生平经历和创作年代,于各类石刻文献的利用极其充分。

这里想先讲到与杜甫研究有关石刻的发现情况。清末在西安发现的因为父寻仇而死的杜甫叔父《杜并墓志》,无疑是杜甫家世研究极堪珍视的文献。近代以来,虽然没有杜甫家人或其本人撰文的墓志出土,但与其有密切交往人物的相关碑志,已发现有十多通,不乏可资考订其作品和生平的重要线索。杜甫最密切的朋友苏源明(苏预),杜甫称其“前后百卷文,枕藉皆禁裔”(《八哀诗》),韩愈视为唐初以来最重要的文士之一(《送孟东野序》),但留传下来的只有《唐文粹》收录的两篇诗序。近年在洛阳出土了其撰文的《管元惠碑》,在陕西出土了《大唐故左威卫将军赠陈留郡太守高府君(元珪)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宝一一八),后者作于天宝十五载苏源明任国子司业时,由顾颉谿书,正是杜甫与其来往密切时,也为杜甫晚年诗《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追述早年同醉长安之事增一佐证。同时,我很怀疑杜甫《故武卫将军挽词三首》就是悼高元珪之作,武卫二字很可能是后人避后周郭威讳所改,当然这仅属推测。

杜甫最为人传诵的作品《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写给尚书左丞韦济的。南宋黄鹤注此诗:“公以天宝六载应诏赴毂下,为李林甫见阻,由是退下。诗云:‘主上顷见征,青冥却垂翅。’当是七载所作。”只是推测,但后世多沿其说。据西安所出韦述撰《韦济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宝〇九

九),韦济于天宝七载转河南尹,九载迁尚书左丞,十二载出为冯翊太守。杜甫此诗应作于九载以后的一二年间。

杜甫大历五年避臧玠之乱出奔衡州,是投奔衡州刺史阳济的。《千唐志斋藏志》收《阳济墓志》云:“出为潭州刺史,转衡州刺史。遇观察使被害,公以贼臣逆子,罪之大者,遂率部兵,遽临叛境。俄辛京杲至,靖潜害能,贬抚州司马。”从阳济由潭州转刺衡州的经历看,应是大历四年夏湖南观察使治所从衡州迁往潭州的时期,其职务应是与韦之晋交接的,杜甫有可能在当时已与其相识,并成为第二年遇乱南奔的原因之一。杜甫《入衡州》诗云:“中有古刺史,盛才冠岩廊。扶颠待柱石,独坐飞风霜。昨者间琼树,高谈随羽觞。无论再缙绶,已是安苍黄。”《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中丞连帅职,封内权得按。身当问罪先,县实诸侯半。士卒既辑睦,启行促精悍。”“似闻上游兵,稍逼长沙馆。邻好彼克修,天机自明断。南图卷云水,北拱戴霄汉。美名光史臣,长策何壮观。”(均见《杜诗详注》卷二三)均与墓志所述阳济出兵进逼长沙叛军的记载一致。《旧唐书·代宗纪》载辛京杲出镇湖南是五月癸未事,阳济被贬的原因,墓志只提供了一种说法,不排除阳济有夺取长沙地盘的考虑,其被贬估计即五六月间事,杜甫的再南下未阳,是否与此有关,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游仙窟》作者张鷟(文成)晚年得罪流贬岭南,唐末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曾略记狱事端委。《洛阳新获墓志》所收河南伊川1977年出土徐浩撰《张庭珪墓志》中,有“其详刑也,免张文成于殊死,谏张真楷于极法,回九重之听,进谏议焉”数句,为了解其晚年陷狱及流贬岭南的缘由,提供了可贵的记录。顺便提到,《四库存目丛书》影印陕西文管会藏旧抄晏殊《类要》,引有李吉甫《类表》残文,其中有张鷟《谢流表》一段云:“特蒙免死,配流岭南,秦谍再苏,陈焦重活。往前之命,父母所生;此后之年,天恩所赐。”这些都证明要处死张鷟的决定由玄宗作出,而因为张庭珪等的力谏,方得免死贬流。

盛唐诗人李颀的生平资料不多,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推定其应卒于天宝十二载《河岳英灵集》结集以前,而其作品的下限只到天宝六载为止。《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收其天宝十载六月撰《故广陵郡六合县丞赵公墓志》,署“前汲郡新乡县尉赵郡李颀撰”,可知其十载还在世。